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八十二期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编者的话：历史唯物论传入中国已逾百年，直接导入中国的变革实践，也已七十多年。我们在已有了这么多生聚教训的今天，推荐张显扬先生这篇对历史唯物论批判的文章，以期引起积极的思考。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任何东西”自然也应该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在人类认识史上作为一种学说，一个学派的出现，为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一个视角，做为一种工具，本是正常的，也是积极的事。但是，问题在于，它自认为是开启人类社会和历史迷宫大门唯一的钥匙，运用它去认识社会和历史，就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从而使人这一认识主体变成了被“理论掌握”的工具。同时，它这种强烈的排他性，使得“马克思主义者”们把其它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都视为异端邪说，一旦取得统治和垄断地位时，便阻滞人们在实践中对其它学说的选择、比较和吸纳。

尤为严重的是，它赋予自身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更能够改造世界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的那句惊心动魄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至此，在历史上“被构建”的理性要反过来“构建”历史了。“自在”不但要变为“自觉”，而且要变为“自为”。自古以来知行分立的禁忌被打破，非理性与理性、自发与自觉合力的社会演化中断了，“看不见的手”被当作“盲目性”加以取缔。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命运告诉我们，一旦知行合一，政教合一，道势合一，没

有不出乱子的。

运用历史唯物论去认识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便产生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它的前提与其说是功利的、基于事实判断的，毋宁说是道义的、基于价值判断的。也就是说，不是因制度的“无效率”而加以反对——资本主义就是“效率”，它创造的进步与繁荣举世公认——而是因制度的“无道义”而加以反对。与其说他寻求的是一个“效率”的世界，不如说是一个“道义”的世界。而“效率”不过是“道义”的物质条件，所以“效率”的资本主义被当作“道义”的共产主义的前提。

但这一物质与道德的地上乌托邦不在人类经验的范围之内，亦不能成为人类现实的目标，实践中也行不通。历史唯物论的跻入并没有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共产主义遥遥无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只好无限期地“过渡”下去。

而这一“新制度”的出现恰与马克思的愿望相悖，是新的压迫制度，而且更甚。正如一位犹太教哈西德派的长老在评价法国革命时所说：“对公正进行推论是疯狂的”。马克思在书斋里运用历史唯物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析和对未来的展望，即对公正进行的推论，似也类此。

趋势与选择

——对历史唯物论的解读与批评 **张显扬**

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失败以后，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力固守历史唯物论这个阵地。以为这样做，退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脱离干系，进可以为社会主义的未来保留一片绿洲。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历史唯物论。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违背了历史唯物论；只要坚持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终将取得胜利。

说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是没有错的。在国际学术界，历史唯物论常常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问题是，坚持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就能胜利吗？实际上，历史唯物论自从催生“科学社会主义”以后，和这个理论的实践没有发生过任何积极的关系，既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指导，也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指点迷津，甚至也无力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解释。

面对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胜利和失败的曲折历程，我们的理论家们不去进行认真的反思，仍然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无条件地托付给历史唯物论，其情可嘉，其意谬矣。

一、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是大大可疑的

历史唯物论从十九世纪 40 年代中期发端，到 1859 年马克思以经典形态加以表述，再到恩格斯逝世，整整半个世纪，其间历经几多变化，可是有三个概念始终不变，这就是“决定”、“必然性”和“不能跳过”，它们构成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框架和最核心的主题词。把这三个概念连接起来，就是历史过程中各个社会参数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决定一个的，历史的发展是受必然性支配的，因而任何发展阶段都不能跳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这句言简意赅的话，道尽了历史唯物论的精髓。卡尔·波普尔等西方学者把历史唯物论归入历史决定论的范畴，是一点不错的。实际上，列宁就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决定论”。直到今天，一说到历史唯物论，人们想到的就是这个历史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研究马克思的人，特别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马克思本人说过的、后来被刻在他墓碑上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没有不背得滚瓜烂熟的；对同样可以归到马克思哲学名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更是不厌其烦。可是很少有人想到，用这两条去衡量一下历史唯物论本身，好象它是写在天穹上的神谕，是可以超越一切评价标准的。实际上用这两条去衡量一下，就不难发现，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是大大可疑的。

恩格斯晚年在回忆历史唯物论的时候说，历史唯物论曾经被用于三个历史层次：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于“全部近代史”；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用于“一段现代史”；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里，用于“当时发生的政治斗争”。这里所说的“用”，是指“用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历史，也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用来“解释世界”。我认为，这样的用，即使用得很成功，很得心应手，也不足以证明历史唯物论的真理。因为，解释得再好，也只是解释而已。解释，只要不把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弄错，只要没有这些硬伤，是无法证伪的。只有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成功，才能真正证明我们认识的真理。

明确地说，只有社会主义实践，才是检验历史唯物论的最恰当、最权威的标准。历史唯物论是干什么的呢？是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两大基石之一：有了历史唯物论，有了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就从空想变成科学。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才能最终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历史唯物论还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检验，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理论领域里活动。真正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那时，他们二位已经不在在了。

历史唯物论经受住了 20 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检验了吗？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有辉煌的进军，也有惨重的失败，其间大大小小的事件发生过无数。而最重要的被认为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大事有四件：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加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理应（按历史唯物论之理）发生而实际没有发生革命这件事，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总共有五件大事。这五件大事应该成为检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的最重要的尺度。

现在，我们就来评论一下社会主义实践和历史唯物论的相互关系。为了节省篇幅，这些大事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背景等等，一概略去，我们只就确凿无疑的结论来加以讨论。就从十月革命开始吧。

对十月革命，历来有各种看法，有说它是一场政变，而不是一次革命的；有说它是一次革命，但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我认为，就其否定方面，即从它打倒地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这一点来看，十月革命绝对是一次符合“科学社会主义”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它的肯定方面，即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种制度，推行的各种政策法规，是否合乎社会主义的要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正如人们早就指出的，它的肯定方面，是必须否定的，那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

按照历史唯物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半亚细亚国家，生产力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像孟什维克这样的革命队伍中的右翼，拒绝在民主革命之后，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列宁却坚决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果然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那些迂夫子们，其中包括列宁所说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以及像普列汉诺夫那样著名的孟什维克，还死不服气，硬要把“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拿来作为评价十月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尺度，企图从理论上否定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列宁断然予以驳斥。他在《论我国革命》这篇著名的政论中，对他们的迂腐之见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第一，列宁质问他们：“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第二，列宁反驳他们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

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的反驳不仅雄辩，而且合情合理。把他的两个论点提到理论上说，就是社会变革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生产力水平也不是什么绝对标准；可以经济变革在前，也可以政治变革在前；只要出现有利变革的形势，革命者就要勇于变革。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苏联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很快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赶上并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证明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

列宁正确了，历史唯物论又当如何呢？历史唯物论遭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否定，它不但没有为这个革命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反而用它僵硬的决定论为反对这个革命的人提供了口实。要不是列宁的坚持，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工兵农英勇奋斗，俄国差一点丧失一个实行决定性变革的历史机遇。至于这次变革，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去评估，究竟对俄国有利还是不利，这是一个需要另行研究的重大课题。研究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将肯定或否定列宁的观点。但是，即使否定了列宁的观点，也不能因此而证明马克思的决定论正确。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是不能仅仅靠否定它的对立面而得到证实的。这是逻辑学的常识。

列宁是一位娴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深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将会造成巨大冲击。为了维护历史唯物论，列宁提出一个假设：“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列宁没有论证，他把这一点当作无须论证的公认的事实。如果列宁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当然两全其美了：既维护了作为决定论的历史唯物论的权威，又捍卫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但是，历史没有善待马克思，也没有善待列宁。列宁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实际情况，因而敢于提出那样一种假设。后来的革命进程表明，列宁的假设不能成立。如所周知，继十月革命之后发生革命的国家，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除个别例外，简直是一个比一个落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马克思本人曾寄予厚望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当代无人可比的美国这样超一流的发达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到处都是“特殊性”，即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先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历史变革的总的顺序又在哪儿呢？

现在，有些论者津津乐道于马克思关于“四肢”和“心脏”的比喻，以为这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实际，并且和列宁的假设相呼应。其实，这完全是弄错了对象。马克思这个比喻是在论述 1848 年法国革命时提出来的。他是这样说的：“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的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形式出现的……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

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我们姑且不论马克思的这个比喻，在医学上是否正确，这里说的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机体”中，具体地说，是在西欧，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有这样一种犹如“四肢”和“心脏”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次发达国家和最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指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所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不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机体”，都是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因此，这个比喻根本说明不了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再说，在“资产阶级世界”，这个比喻也没有成为现实。今天再拿它来说事，实在是硬做文章，一点意思也没有的。如果还要把它引伸到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上，那只能和历史唯物论开玩笑：如果“四肢”即落后国家原则上就应该比“心脏”即发达国家先期发生革命，那么，以生产力为发端的历史唯物论还剩下什么呢？。

现在我们来讨论“历史必然性”的问题。十月革命否定了僵硬的生产力决定论，否定了历史发展阶段不能超越的断言。可是十月革命难道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吗？的确，人们历来都这么说，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认为，那是一次偶然的胜利，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我认为，说它是一次偶然的胜利，过于轻佻，说它是果断地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随机因素造成的有利形势，从而取得了胜利，倒是事实。俄国是被帝国主义拖进战争中去，就其自身的历史发展来说，这场战争完全是一个随机事件。这一点，不必在这里讨论。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十月革命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盲目的意识形态取向，常常使人不合逻辑，这里算是一个典型。十月革命是不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这个问题，是从一个预设的虚假前提出发的，好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经验的存在，因而来问：十月革命是不是这种必然性的表现。这就把事情弄颠倒了。直到十月革命为止，甚至直到今天为止，所谓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只存于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胎胞里。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必然性，正需要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加以证实。我们看到，就十月革命而言，完全说不上什么“代替”的必然性。当时的俄国，如上所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正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作为它的发展形式，那里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根本不发生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俄国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哪里有什么“必然性”可言？

再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一边。马克思的“丧钟”敲了一个半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本身就对这个必然性提出了质疑。不错，征诸世界历史，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永世长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永世长存，总会被某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是毋庸置疑的。美籍日本学者福山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中作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是过于短视的。无论在哪个意义上，历史都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不过，我认为真到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人们也许会发现，它的死因与马克思博士当年的诊断并无关系。马克思当年面对的是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从文明发展阶段来说，那是工业社会刚刚形成的时期，而现

在已经是后工业社会了。他据以作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结论的那些社会参数，诸如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劳资关系、阶级构成，以致管理模式、技术水平，等等，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年资本主义没有死在马克思的预期里，算是逃过一劫，今后要死也不会死在他的诊断上了。明确地说，除非重新加以论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肯定已经失去时效。如果今天还把社会主义的前景寄托在这个论断上，那无异于自欺欺人。社会主义的根据，——如果有这样的根据的话，不应该到历史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到这个世界本身中去寻找。

总之，决定、必然性、不能跳过，历史决定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在十月革命面前统统碰壁。那么能不能把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看作是对列宁违背历史唯物论强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报应，从而多少可以为历史决定论留下点什么呢？我的答复是，苏东剧变，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与早产的十月革命没有关系。早产的十月革命带来的困难，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运行中有其反映，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困难早已被另外一些困难和矛盾所代替。苏联的失败，根本不能用什么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或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类历史唯物论概念去解释。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历届苏共领导人面对斯大林模式造成的危机作出错误选择的结果。先是在改革与不改革中选择不改革，1956年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20大，本来是很好的改革的开端，但被保守的勃列日涅夫们扼杀了。继而又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乱了方寸，选择了错误的路径，并且一错再错，最终导致失败。而且，即使选错了改革的路径，形势非常危急了，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断然的铁腕手段，苏联也未必失败。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铁腕手段，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明智之举。可见，既不能说苏联的失败是必然的，也不能说苏联的失败是偶然的。这些概念在这里什么也说明不了。

在结束我对社会主义实践与历史唯物论相互关系的考察之前，不能不说到中国革命。中国是一个比俄国还要落后的国家，毛泽东把它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都很困难，何况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可是，中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过渡，很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和历史唯物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搞早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据……”读到这些话，我们好像又回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与苏汉诺夫们的争论。在这里，历史决定论又一次站错了队！

二、解释历史的方式并不是变革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论本来是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而创立的，可是临到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它不但没有为之提供指导，反而成了一种必须加以克服的“机械论”和“右倾”的思想障碍，这是马克思始料所不及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马克思 1879 年 4 月致柯瓦列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说过的几句话，倒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事情的原委。他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个极为重要的区别：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自认为提供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有这种情况，可是马克思本人恰恰就是如此。他自认为给变革历史提供了一个指导思想，实际上只是给解释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历史唯物论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显得头头是道，一旦需要它对变革历史提供指导时，却不是弄错了，就是完全无能为力。

马克思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区别，恩格斯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以为这是一回事。因此，一方面，一再告诉人们，历史唯物论就是“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或“解释”历史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非常自信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同样，列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区别。他一方面宣称，历史唯物论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认定它是一种指导思想：“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历史唯物论既是解释历史的方式，又是变革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论作为解释历史的一种方式，确有一定的有效性：当它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截取一个环节予以解释的时候，它是比较有效的，这就是用经济去解释政治，解释国家设施、法的观念等等。这一点，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常识，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之一。但是，超出这个范围，在因果联系的另一个环节上，在经济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上，它就无能为力了。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很公正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中最需要改正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的原因。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为基本原因出现的，而它们在不断变革的理由却完全没有得到解释。”的确是这样，马克思甚至连这样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马克思难道不知道这里有明显的脱漏吗？我认为，发生这样的问题，原因在于学者马克思是服从于和服务于革命家马克思的。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所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变革的问题，而不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如何发展变化的问题。生产力、生产方式是他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据和出发点，至于它们本身如何发展变化，不是他关心的事情。既然如此，作为学者的马克思，自然会在理论上去研究这些问题。一个世纪以后，有人像发现新大陆似地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这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重视的，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生产力的解释学意义，即发展生产力对于变革生产关系、变革社会的意义。他的任务是破坏旧世界，而不是建设新世界。正因为如此，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应当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进行建设，这在马克思著作中除了“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类原则性的指示而外，找不到多少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性意见。上世纪 80 年代，自称“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于光远先生，提出要发展“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于光远先生的这个想法完全无可非议。

你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原来的理论中又没有多少可用的思想资源，不发展“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于光远先生这个想法竟遭到否定和批判。

恩格斯晚年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意识到，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解释，在理论上是一个缺陷。于是，他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去解释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应该说，这个解释方向是对的，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到位。他一方面强调反作用的不可避免和重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历史决定论的限制，又竭力压低反作用的力度。他认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又说：“物质生产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产方式起作用，反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可以看出，恩格斯进退维谷：不承认反作用，无以说明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变化；把反作用说大了，又有背于历史决定论。这样，他就没有也不可能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整个社会确如历史唯物论所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样四个参数，那么这四个参数应该构成一个自我循环、自满自足的系统；其中每一个参数的发展变化，只能从其他三个参数得到说明，而无所谓哪个力量大，哪个力量小。否则，岂不要突破这个系统到外面去寻找“第一推动”吗？而且，既然是“作用和反作用”，那么说它们力量不相等，一个力量大，一个力量小，也不合逻辑。但是，为了不至于违背历史决定论，恩格斯也只能如此了。

至于说到谁是第一性的作用，谁是第二性的作用，那完全取决于你从哪里开始，把什么作为出发点：从经济出发去解释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就是第一性的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对经济的作用，就是第二性的作用。相反，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去解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就是第一性的作用；经济反过来对政治的作用，就是第二性的作用。所谓第一性、第二性，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无非是指初始概念和后续概念、原因和结果之类的区别。除了在物质和意识的最原初的相互关系上，只能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外，在历史长河中，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过程中，无所谓哪个社会因素一定是并且永远是第一性，哪个社会因素一定是并且永远是第二性。恩格斯这样说，似乎忘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又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在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的位置是不断变换的。当你想解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既定的事实，作为结果，是有原因的，经济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你想解释经济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经济作为既定的事实，作为结果，也是有原因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重要原因。难道生活实践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你怎么解释？难道不是得从毛泽东归天、“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说起吗？没有这一切，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有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跛足的改革理论，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腐败成风的局面。这不就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去解释经济，解释社会吗？如果在这里硬要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作用，说成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有什

么意义呢？或许有人会说，三中全会的决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等等，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从过去的实践，从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说得很对。但是，你这已经转换了场景，说的是另一个因果环节上的事了。这样说，正好表明，你承认因果关系是可以变换位置的。这也就是说，所谓第一性、第二性，并不是一对固定不变的概念。

总之，历史唯物论只是解释了历史链条中因果联系的一个环节，而没有解释另一个环节，没有对被认定为历史起点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决不能说“马克思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最多只能说，马克思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他纠正了以往人们只从政治和思想中寻找历史变化动因的偏颇。可惜的是，他由此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另一种偏颇。

以上我们对历史唯物论解释历史的方式进行了解读和评论，现在可以来谈谈为什么不能把解释历史的方式同变革历史的理论混为一谈。

首先，解释历史是有选择性的，总是从一定的需要和一定的角度去进行解释。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解释都是这样，历史唯物论也是这样。从解释历史中得出结论，需要进行抽象，因而相对于历史本身，都是不完备的，有局限性的。用这些结论去指导变革历史的实践，不可能普遍有效，有的可能有效，有的未必有效。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意识，不要把有选择性的解释同有普遍性的理论混为一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特别是他们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显然都缺乏这种意识。他们一无例外地认为，历史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一来，一方面使人们对历史唯物论抱有过高的期望，另一方面也给历史唯物论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一个半世纪来，人们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争论，多半源自于这个矛盾。

为了说明解释历史的方式并不是变革历史的理论，我想引用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贪图》一书中的一段话，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把这些解释当作理论。这是它的重大错误之一。比方说，把‘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或种族优势斗争的历史，或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斗争的历史，或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兴趣的观点，而且其本身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历史决定论并不这样说：它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别富有成果——从某种重要性来看）。反之，他们却把历史解释当作学说或理论，断言‘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富有成果的，并且许多事实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释，他们就错误地以为这是他们学说的证实甚至证明。”

的确，解释历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这些选择在有效性方面可能有差异，甚至很大的差异，但谁也无权说，我这是唯一科学的解释。我们看到，历史唯物论对历史的解释，在起点和终点上都是有选择的。马克思以生产力为起点来解释历史，而不是以任何别的东西，例如以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为起点，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从生产力出发，经过层层推论，最后得出“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结论，这又是一种选择。实际上，即使从生产力出发解释历史，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也可以说“全部历史都是各社会群体包

括各阶级之间互助合作的历史”。为什么不可以呢？一个社会要生存下去，要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也就是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只有斗争，没有合作。这一点，考茨基早就说过了。即使在生物界，生存斗争的理论也是片面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很清楚的。可以肯定，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彼此间依赖程度的加强，越往后各社会群体包括各阶级之间、甚至各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的趋势将越强，而斗争将越来越限制在人类文明和理性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

不能把解释历史的方式同变革历史的理论混为一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者的思想行程不同。解释总是对已成之事的解释，是从结果推断原因；而变革则是对未成之事的预期，从原因推断结果。在两次推断中，认识上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两次误差。从结果推断原因，其间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影响，难免故意舍掉和贬低一些实际上可能很重要的环节，或者相反，故意夸大、甚至添加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环节，因而推断出来的原因与结果之间未必具有必然联系，甚至未必就是这个原因。10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据说，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乱的结果！与毛泽东特别是和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没有关系，至少没有本质的联系。这就是意识形态曲解历史过程中因果关系的一个典型的例证。从这样推断出来原因出发，再去推断结果，会再一次受到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推断出来的结果与实际发生的结果可能相去甚远。由于没有对文革作出正确的总结，故意回避了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在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同时，拒绝民主化政治改革。结果，国家经济是繁荣了，GDP获得了惊人的增长，社会却走到邪路上去了，与原来预期的民主、法治、文明的目标渐行渐远，社会公正荡然无存。邓小平许诺的“共同富裕”只存在于统计学的平均数之中。就像一则黑色幽默所说的，虽然我只有100元，但是你有100万元，一平均，我不也有50万多一点，谁说我不富裕？

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可以补充说，任何历史，都是有话语霸权的当代人的历史。无论解释过去，还是推断未来，都和这些拥有话语霸权的当事人的意识形态取向，即他们的主观选择分不开。由于存在着认识上的双重误差，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从过去已知的因果联系出发，在较大的时空跨度上去预见未来，总是错的比对的多的。谁也不敢吹牛，他能洞察一切，未卜先知，一说就是一万年如何如何。这都是独裁者故弄玄虚的假深沉，完全是骗人的把戏。

两次选择、两个误差，使得任何解释历史的方式都不可能无条件地成为变革历史的理论。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深信自己凭借历史唯物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可是他在预见未来的时候，虽然说对了一些事情，但在重大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却一次也没有说对。他先是认为英国将首先发生革命，因为英国生产力最发达；继而认为法国可能首先发生革命，因为法国人长于政治斗争；接着又寄希望于德国，因为德国人有理论。在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后，又把目光转向俄国。几经犹豫，最后对俄国革命和俄国土地公有制制作了一个假言判断：“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882年，35年后，

即 1917 年，俄国爆发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并没有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虽然擦出了几个火花，终于没有燃起大火；而俄国的土地公有制在这之前早已土崩瓦解。这就是说，即使以假言判断作出的最为谨慎的预言，也一样落空了。

不能把解释历史的方式和变革历史的理论混为一谈，还有一个操作上的原因。前两个原因是理论性的，现在这个原因是实践性的。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不需要任何操作，不需要对当下的形势作出判断，只要把矛盾、危机等经济政治概念大体上排列出一个逻辑顺序，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给人提供一种理解历史进程的思路，就算解决问题了。可是，变革历史，就不能模模糊糊，大而化之，必须直面那些操作上的难题。历史唯物论，没有为解决这些操作上的难题提供有效的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一再落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体判断上的困难造成的。这一点，后来他们自己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对自己那一套历史决定论进行实质性的反思。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论，的确只是一种解释历史的方式。当然，对于变革历史也不是没有意义，那就是为“批判旧世界”提供了一套框架，使决意“创立新世界”的社会力量受到启发和鼓舞，并实际地投入斗争。至于所谓指导作用，那是完全说不上。不仅如此，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决定论，在实践中往往走向反面，表现为唯意志论和独断论。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典型。他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列宁）的书里学了历史决定论，接受了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思想，于是就宣称“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正是这种自以为懂得规律的狂妄和自负，使他产生了类似“替天行道”的意识，感到自己好像就是真理的化身，历史必然性的化身，因而一旦大权在握，便不顾一切地去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妄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这种唯意志论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最典型、最疯狂的表现。实际上，懂不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懂不懂得“辩证法”，这与共产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并无关系。再说“事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不是读几本马克思的书就能懂得的。如果事情那末简单，我们何至于犯那么多错误，吃那么大亏，死那么多人？

三、历史是趋势与选择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历史唯物论的三个核心概念中，“决定”的概念是比“必然性”和“不能跳过”更加基本的：既然历史过程中各个社会参数是一个决定一个、一个跟着一个的，那么历史变革的进程当然就是必然的了，从而历史的发展阶段自然不能超越。说历史唯物论就是历史决定论，关键就是这个“决定”的概念。历史唯物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在学理上受到的种种批评，都和这个“决定”概念分不开。

这个如此神通广大而又如此不中用的“决定”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既是马克思、恩格斯解释历史的工具，也是他们解释历史的产物。确切地说，是他们用抽象思维的方式解释历史

的产物。他们为了反驳历史唯心论从思想中寻找一切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以及把政治变动看作一切社会变动中最重要、决定全部历史的变动的观点，决意去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在为政治变动寻找原因的时候，他们把目光专注于社会的经济方面，而抽掉了一个重要环节，即抽掉了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人的行动，一句话抽掉了人的能动性。一当他们认定经济状况是政治变动的原因的时候，就宣布政治变动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简单地说，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在这里，他们陷入了一个真正的误区：忘记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因果联系与自然界的因果联系是有重大区别的。在自然界，因果联系是直接的、没有中介的：结果直接决定于原因，原因直接产生结果。如果一个已知的原因没有产生相应的结果，那么这个情况一定另有原因。社会历史领域与此不同：没有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任何前件（原因）都不会自动地产生后件（结果），这里的因果联系是通过人的中介、人的活动实现的。明确地说，在社会历史领域，被称为原因的事件并不“决定”结果，而是人的活动把它导向一定的结果。社会经济状况无疑是政治变动的主要的和重要的原因，但它不能“决定”政治变动，是人对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认定它对政治方面有某种需求，才决定进行政治变动。一句话，政治变动是人们从政治上对经济状况作出的反馈，而不是经济状况决定的。

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政治变动在内，都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在起作用，没有一件事情是只有客观原因而无主观原因的。也就是说，总有人和物这样两个方面。在政治变动的背后不光有经济上的动因，还有人的行动。既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追溯政治变动的原因的时候，为什么只讲经济的决定作用，而不讲人的能动作用呢？

恩格斯尽管说了“并不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又说了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他那里却根本不发生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即一方面是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人的行动。因为，在历史决定论的逻辑里，政治变动和人在政治变动中以意识形态为中介的行动，都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所以，在追溯政治变动的原因的时候，只要说到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就算把问题说清楚了，而完全无需提到人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论去解释历史过程的时候，一点也不否认人的活动，不仅不否定，而且还描述得十分详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政党、阶级、国家、议会等等如何行动，如何斗争，但是，当他从理论上归纳政治变动的原因的时候，也和恩格斯一样，除了经济，根本找不到人的影子。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不过是经济状况实行政治变动的道具，就像在牵线木偶戏中那些木偶不过是牵线人演出的道具一样。可见，所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其实不过是“人们为经济状况创造历史”。

行文至此，我们进入了历史唯物论真正的腹地。“决定”这个概念曲解真实的历史过程的最主要、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歪曲和抹煞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把人仅仅当作经济必然性的玩偶。在历史唯物论体系中，人也是能说能笑，能蹦能跳，有七情六欲的，但他的作用只限于在经济状况的支配下，在社会的“自然历史规律”设定的轨道上，把社会运动的列车向前推进得快一点或慢一点，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缩短和减轻”社会分娩的痛苦；至于这辆列车

的行进方向，他是完全管不着的。这样的所谓“能动性”，只能和牵线木偶在舞台上的表演相媲美，与其说是能动性，不如说是被动性，或貌似能动性的被动性。试想一下，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人是如此被动的吗？

人的真正的能动性，决不仅仅是加速或延缓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转折关头或者说关键时刻，可以选择发展的方向。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都会一再地面临这样的转折关头，正是那些被胡克称之为“历史中的英雄”的人物作出明确而坚定的选择，给处在十字路口的社会指出一个方向，使它不再犹豫，不再徘徊，而勇往直前。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作出选择的历史。没有选择，就没有历史。选择，这是人在历史过程中真正的能动性的表现。

生活实践，特别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就是这样作证的吗？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领导俄国革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中国革命，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领导中国改革开放，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作出的重大选择。革命和改革胜利了，人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就应当胜利，实际上历史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究竟向何处去，是没有定数的，全靠人的选择，人的努力。就拿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毛泽东一死，留下一堆烂摊子，“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提到国人面前。有人主张“两个凡是”，这是一种选择；有人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又一种选择。前一种选择要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路，也就是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一种选择要走“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是两种选择，两个命运的博弈。最后新路战胜老路，中国才有改革开放一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又有邓小平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片面改革”或“跛足改革”和胡耀邦、赵紫阳的经济政治同步改革的“全面改革”之争。如果“胡赵新政”不被扼杀，今天的中国就会是另一种面貌。

实际上，人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随时随地都在选择，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所谓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选择，一切都是被决定的，这个历史还用自己写吗？人为什么犯错误？就因为他总是在选择，而且不能不选择。如果一切都是被决定的，那就无所谓正确，无所谓错误，也无须承担责任。在人类思想史上，像历史唯物论这样否定人的选择的能动性的理论，并不多见，只有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念论、托马斯·阿奎那的神政论庶几近之。在这个历史哲学体系中，人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国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生产力统统都不能选择。“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里更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马克思 1846 年提出的这个“决不能自由选择”的论断，作为一种否定性的表述，一直保留在历史决定论中，成为否定人的选择的能动性的一个最经典的论点。所幸历史和现实都没有向这个论点表示敬意。实际情况是，不仅政治国家是人们自己选择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也都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就

是马克思认为最不能选择的生产力也不是不可以选择的。昨天的生产力是祖宗留下来的，我无法选择，我一生下来面对的就是这个生产力。可是今天的生产力为什么不能选择呢？我们现在不是提出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吗？发展先进生产力，这就是对生产力的一种选择。发展先进生产力，就要选择那些和高新技术相联系的生产力。按照 863 计划，我国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海洋技术和新材料等 7 个高新技术领域作为发展的重点，和这些高新技术相联系的产业，都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如果生产力是不能选择的，我们怎么能调整产业结构，全力以赴发展先进生产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历史上，落后国家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的事例比比皆是，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在正确的发展战略指导下，选择高新技术的前沿阵地，加大投入，一举占领制高点，然后把最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他们就赶到前面去了。如果生产力不能选择，岂不是落后的永远落后，先进的永远先进吗？今天，我们放眼世界，看到的正是各个国家为选择和发展先进生产力而进行激烈竞争的情景。生产力，这是一个最需要选择、也是能够选择的领域，历史唯物论却认为它是最不能选择的，足见历史唯物论对它自己的起点是多么缺乏认识，多么懵懂！

总之，人是能够自由选择的，说人不能自由选择，是完全错误的。不要在“自由”两个字上做文章，好像自由选择就意味着随心所欲，想入非非，甚至无中生有。选择总是对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各种趋势和可能性的选择，客观上没有的东西是无法选择的。选择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概念，是一个实践的概念，不是一个主观概念，不是纯理论的概念。所谓自由选择，就是在各种趋势和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自由。不能自由选择，等于不能选择。马克思为了否定人的选择的能动性，特意在选择之前加上“自由”二字，以便使“选择”显出更多的主观性，这是很没有意思的。选择就意味着自由，加不加“自由”二字都一样。

历史唯物论曲解真实的历史过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当作与自然界一样的“铁面无情的规律”。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趋势与规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一点，恩格斯晚年自己就说清楚了。他在给施米特的信中，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时说，“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又说，工资规律、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来分配的情况也是这样，都“只是在平均数上近似地符合。”这就是说，恩格斯也承认，他和马克思所发现的那些所谓规律，都不过是趋势而已。既然只是趋势，又何来“铁面无情”、“铁的必然性”？撇开这个矛盾不说，恩格斯是对的，一般所谓经济规律的确不过是一些趋势。那些比一般经济规律抽象程度更高的所谓历史发展规律，当然更是如此。事实上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等等，也都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生产力发展了，处在生产过程中的人，就会感到原来的生产关系有某些不适应，需要加以调整。但是，究竟作不作调整，怎样调整，还得由人——不仅是作为生产力的人，而且还有其他社会角色的人——自己去决定和选择。生产力既不能对人的决定和选择作出决定，也不能对生产关系作出决定。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铁面无情的规律”、“铁的必然性”之类。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情况也是这样。如果社会历史的发展，像决定论所说的那样，那么，世界上的事情岂不是太简单了吗？

如果生产力能决定生产关系，那末人们在调整生产关系的时候，就永远不会出错了，调整后的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可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要找到一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多么不容易。改革开放已经四分之一世纪，我们至今没有把生产关系调整到位，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此外，如果生产力能决定生产关系，那么，同一个水平上的生产力就会有同样的生产关系。而事实上，不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差不多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上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就是同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差不多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上也有不同的生产关系。英国不同于法国，美国不同于日本，如此等等。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规律，不过是维多利亚时代极端理性主义者的空洞抽象而已。

当我们廓清了历史唯物论的“决定”、“必然性”、“铁面无情的规律”等等迷雾之后，真实的历史过程就显现出来了：这里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趋势与选择。历史就是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前人在对某种发展趋势作出选择之后，经过努力、劳作和辛苦，造成种种新的趋势；当代人就在这种新的趋势中作出选择，然后又是努力、劳作和辛苦……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把历史推向前进。这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平稳的、没有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不同的利益群体会有不同的选择，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和斗争。究竟哪一种趋势能够发展起来，取决于种种条件：趋势本身有强有弱，选择者的力量和智慧也各有不同。一般说来，胜者不是因其选择的趋势较强，就是因其本身的力量和智慧较强。除此而外，随机因素也起相当作用。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会有一定的随机因素参与其间。这些随机因素为历史事件提供导因，或者有利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或者不利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不可能发生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未必能取得胜利，无怪乎毛泽东要给日本帝国主义颁发勋章呢。没有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不会有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9.11恐怖袭击，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当事者在多种趋势中作出的选择；但是，对于俄国、中国、美国来说，都不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有机因素，都是外来的、强行介入的随机因素。

和历史决定论相比，趋势、选择和随机因素也许没有带着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风尘的“决定”、“必然性”、“不能跳过”等概念那么厚重，但它们更贴近历史实际。如果把这三个因素的组合也看作某种理论，那我认为称之为“历史选择论”，是名至实归的。现在它还算不上什么理论：对于历史唯物论，它是解读和批评的工具性概念；对于历史过程本身，它是描述性概念。要使它成为一种理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虽然如此，我相信，“历史选择论”与历史决定论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断然恢复了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历史本来是人的活动，关于历史的理论，理应以人为本。但是，在历史唯物论中，人成了他的活动产物的附属物，成了经济的玩偶。历史唯物论，就像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是唯“物”的理论，而不是唯“人”的理论。恩格斯晚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唯物论作了新的界定：历史唯物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但是，已经太晚了。在他们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关于经济及其历史发展的论述，而人不过是经济的影子而已。恩格斯提出这个命题，表

明他对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但已经来不及把它发挥成新的理论。实际上，这个命题对于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并未发生什么影响。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中共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根本不知道这个命题为何物。他一看见有人说“人”，心跳就加快，他不许说“人”，即使是“现实的人”也不行，而只能说社会，说经济。足见，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唯物论”。可惜，他已经作古，我们无法就“历史选择论”向他请教了。

“历史选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比，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什么优点呢？至少有两个优点：

（一）它把人从经济必然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有自觉意志、可以自由选择的历史主体。从今往后，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再见物不见人，而是见物更见人。人不再是经济必然性的玩偶，也不再为经济必然性创造历史，而真正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二）它不像历史决定论那样只能解释过去，而在当下则缺乏可操作性，它是可以操作的。从今往后，人们不再需要说那么多大话、空话，动辙就是什么规律性、必然性，而能够把注意力集中于分析研究当下的种种发展趋势，精心予以选择，全力以赴去奋斗。

实际上，人与历史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并且历来就是这样的吗？

（本文发表于波士顿《美中社会与文化》第6卷第2期，有删节。）

作者简介：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已退休。